

解決歷史難題的「喚醒」隱喻

● 杜非、劉平



費約翰 (John Fitzgerald) 著，李恭忠等譯：《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北京：三聯書店，2004)。

費約翰 (John Fitzgerald) 是澳大利亞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2002年獲選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院士，2003年起任澳洲中國研究協會主席，現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1996年，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了

他的《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一書。該書出版後，國內外學術界反響熱烈，1998年獲享譽甚高的美國亞洲研究協會「李文森獎」(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截止目前，西方有二十篇書評、國內有一篇中文書評圍繞本書展開了討論。

該書經李恭忠等人翻譯，已由三聯書店出版(下文所標頁碼均引自原著，費著中譯本有原書頁碼對照)。作為該書的責任編輯(杜非)與校對者(劉平)，我們幾經捧讀，深感有必要對這樣一本有思想力度的專著作些介紹。

一 一個需要喚醒的民族

「奴隸」一詞的思想含義，是與屈辱、麻木、專制落後聯繫在一起的。所以，近代中國的思想先覺者康有為、孫中山、毛澤東都以喚醒沉睡的中華民族為己任。「喚醒」的過程十分艱難，不僅是戰爭與屠殺，而且是無休止的口誅筆伐和陰謀陽

康有為、孫中山、毛澤東都以喚醒沉睡的中華民族為己任。「喚醒」的過程十分艱難，不僅是戰爭與屠殺，而且是無休止的口誅筆伐和陰謀陽謀。所以，我們的國歌至今仍然在召喚「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從匍匐的奴隸到所謂「站起來」的中國人，就是我們所說的中國近代史——其思想層面的轉折點，就是《喚醒中國》一書的主題。

在國民革命中，「喚醒中國」既是革命目標，又是革命策略。「喚醒中國」要求政治運動的至上性和中心地位。這種地位決定了它是國共兩黨的共同任務。喚醒者與相關的機構以及這些機構所要喚醒的對象十分重要。孫中山以種族界定民族，毛澤東則強調社會各階級的差異。國共兩黨最終所選擇的道路雖然不同，但兩黨都是在相同的背景下出現的。

謀。所以，我們的國歌至今仍然在召喚「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從匍匐的奴隸到所謂「站起來」的中國人，就是我們所說的中國近代史——其思想層面的轉折點，就是本書的主題。

中國覺醒的癥結在於「民族」或「民族意識」問題。費約翰是從多個角度來聚焦中國的民族與民族意識之喚醒問題的。他認為，所有關於這一時期的文化史研究都將顯示，「喚醒」一詞是當時使用最廣的語彙，這個詞語的無所不在，有助於解釋當時兩大運動的匯合，一個是民族導向的文化運動，另一個是以建立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為目標的運動。也就是說，民族覺醒觀念，幫助我們把各個特殊的文化領域連接起來，並將之與政治行動領域聯繫在一起（頁4）。

費約翰以「喚醒」一詞為切入點，展現了一個動態的政治中國是如何在二十世紀初期複雜而分裂的社會文化條件下出現的。作者試圖捕捉國民革命廣闊而深邃的精神——熱情、富有生機、樂觀主義以及前進運動中的冷酷無情。他撒開一張大網，對人們所熟知的一系列話題加以重新檢驗。古老中國的這種政治化或曰「覺醒」的過程，既非偶然，也不是單方面的強迫要求，而是眾多演員及眾多觀點在經歷眾多的拉鋸戰中形成的。

綜觀全書，費約翰並沒有用大量篇幅解釋喚醒的過程，他的意圖是要發現「『覺醒』」這個概念在中國曾經有過甚麼含義，它被誰以及針對誰而使用，它可能對民主政治的形式和風格產生過甚麼影響，以及

為甚麼它在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語言中如此普遍地存在，欲回答這些問題，就需要進行一次『航行』，去探索語義學和民族歷史之外的領域。」（頁5）

二 喚醒者的出現

有學者把中國民族主義概念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文化主義決定種族意識的階段（帝國時期），向民族主義轉型的階段（約1860-1919年），民族主義盛行階段（1919年之後）（James Townsend,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7 [January 1992]: 109）。費著在着力於闡釋與「喚醒」有關的多重隱喻後，即全力恢復喚醒者的原來形象，研究時段大約相當於「民族主義盛行階段」，尤以國民革命時期為主。

在國民革命中，「喚醒中國」既是一個革命目標，又是一個革命策略。作為當時政治活動家和知識份子所關注的基本問題，「喚醒中國」要求政治運動的至上性和中心地位。這種地位決定了它是國共兩黨的共同任務。因此，覺醒的過程即意味着兩黨在意識形態的定位上有一個共同的起點，而這一共同基礎對中國政治生活的許多方面產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響（Yiyang Wang, review of *Awakening China*,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vol. 30 [1998]: 127-30）。事實上，在1920至1940年代的三十年中，正是「喚醒」的主角即國共兩黨及其領導人的形成時期。

費約翰指出，喚醒者與相關的機構以及這些機構所要喚醒的對象十分重要。孫中山以種族界定民族，所以，中國社會各階級中的人構成了民族。毛澤東強調社會各階級的差異，正如孫中山將滿洲人排除於民族之外一樣，毛澤東也把資產階級和地主排除於民族之外。國共兩黨最終所選擇的道路雖然不同，但兩黨都是在相同的背景下出現的。

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是如何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的呢？「喚醒政治」是如何在群眾革命運動中走向制度化的呢？費約翰廣泛搜尋有關小說、時尚和建築等文化信息，審視那些似乎是完全不同類型的從知識份子到革命者的「已經覺醒」的中國人。先覺者開始擔負起喚醒他人政治意識的責任。在所有中國人中，先覺者非孫中山莫屬，儘管他是一個夢幻者和空想家，但他最終成了覺醒的中華民族的聖像。在民眾覺醒的政治中，毛澤東是孫中山的繼承者 (William Wei, review of *Awakening China*,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5, no. 1 [Spring 1998]: 132-33)。

三 喚醒者的行動與目標

今天，當人們把孫中山視為「走向共和」的符號時，有沒有想到他同時也是「軍政」、「訓政」的始作俑者呢？你會相信共產黨壯大自身、制敵於死命的宣傳與紀律策略恰恰是由毛澤東在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時學會並發揚光大的嗎？費著告訴我們，事實確實如此。

作者從國民革命時期意識形態、政治、組織、宣傳領域轟轟烈烈的氣象中，揭示了孫中山的民族革命與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的價值取向。這一過程不是孤立的。在一環緊扣一環的敘述中，讀者被帶領着步步深入——從部分知識份子的覺醒，到中國作為一個民族的觀念的增長，到一個在中央政權領導下的民族國家的形成，最終到一個黨，一種聲音——「政治權力在這一過程中的種種運作，使喚醒政治的焦點逐步變得狹窄」。人們發現，民族覺醒的觀念從一種不成熟的衝動，最終演變為一種鮮明的、紀律化的大眾政治風格，並置於高度紀律化的訓導型國家的監管之下 (李恭忠：〈「喚醒中國」的政治文化史〉，《讀書》，2001年第8期，頁35、39-40)。也正是這一條線索，為人們提供了評判國共兩黨得失的標準。

作者分析了孫中山「聖像」的確立與國共兩黨為甚麼都供奉這尊聖像。孫中山被視為那一時代最重要的先覺者和喚醒者。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孫中山並不是信仰自由的人，特別是在1920年代之前。正是孫中山提出以國民政府取代共和政府。他拒絕建立自由民主政府，而是仿行列寧高度紀律化的黨國模式，他相信，對中國革命來說，西方的自由民主觀念已經失效；中國所需要的和孫中山想要得到的是控制。正是孫中山首先倡導一黨統治，爾後為蔣介石所踐行，而毛澤東在擔任國民黨宣傳部長期間，學到了許多關於宣傳、紀律的理論和方法。

孫中山並不是信仰自由的人，特別是在1920年代之前。他拒絕建立自由民主政府，而是仿行列寧高度紀律化的黨國模式，他相信，對中國革命來說，西方的自由民主觀念已經失效；中國所需要的是控制。正是孫中山首先倡導一黨統治，爾後為蔣介石所踐行，而毛澤東在擔任國民黨宣傳部長期間，學到了許多關於宣傳、紀律的理論和方法。

四 理論視野和研究方法

費著的優點在於為我們提供了新視角和新方法，費著與其說是一部嚴肅的政治史或思想史，還不如稱之為一部別開生面的文化史，書中涉及的許多方面，如後結構主義、民族主義研究、符號學等理論的浸染，如建築、繪畫、時尚、文學、倫理、地理學和人種學等研究視角，都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西方的「民族主義」概念大約形成於十九世紀，對民族主義的全方位的系統研究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二次大戰後，反殖民主義的民族獨立運動極大地推進了「民族主義」的世界性比較研究。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在評價費著時說，該書是「一部中國民族主義的演變史……民族觀成了人們生活中的組成部分」(Prasenjit Duara, review of *Awakening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12, no. 3 [Winter 1997-1998]: 137)。從費著有關中國民族主義的敘述中，我們不難得到啟發——孫中山以民主共和(辛亥革命)打倒專制，又飽受民主共和(軍閥混戰)之苦，所以決心再以專制的中央集權來打天下，這一決定使他半遮半掩地接受了社會革命—階級鬥爭的方法。客觀而言，其後果是災難性的。至於毛澤東階級鬥爭學說中的破壞性、專制性、群眾運動和烏托邦特色，對舊社會可以進行有效破壞，對新社會卻少有建設意義。

作者對符號學的應用十分嫻熟，這裏以時尚為例。費約翰發現，民國時期時尚的興起，標誌着一種總體上的進步感：時尚是一個媒介，通過它，人們能跟上自己所

費約翰發現，民國時期時尚的興起，標誌着一種總體上的進步感：時尚是一個媒介，通過它，人們能跟上自己所選擇的民眾團體，隨着時間的流逝而走到一起。通過一個社會理想，時尚把個人和公眾連在一起。中山裝貼上了國民黨人的標籤。後來，共產黨人採用同樣的方法，將中山裝加以改造，開始了一種新的風格——最終定型為毛式上衣，進入了世界市場。

選擇的民眾團體，隨着時間的流逝而走到一起。伴隨着時尚的傳播，其他進步的跡象也出現於文學和藝術、新史學，以及公共博物館和紀念物當中。通過一個社會理想，時尚把個人和公眾連在一起。中山裝貼上了國民黨人的標籤。後來，共產黨人採用同樣的方法，將中山裝加以改造，開始了一種新的風格——最終定型為毛式上衣，進入了世界市場(頁24-25)。

五 幾點商榷意見

目前，已經有不少學者對費著作了客觀中肯的評判，這裏我們結合有關評判作些發揮。

格爾森 (Jack Gerson) 認為，本書有些地方材料堆砌過多，有必要刪除(如第四、六章材料過多，而其他章節則應該作適當的補充)。如果再版，必須注意排印錯誤，削減一些分散注意力的部分 (Jack Gerson, review of *Awakening China*,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32, no. 2 [August 1997]: 295)。實際上，即使是在最精彩的導言和第一章裏，比如在講到「喚醒」的概念及中國人的劣根性時，作者應該忍痛割愛，做些精簡。

杜贊奇認為，本書在結構和行文中存在一些問題。書的中間部分的章節在語氣和敏銳性方面與其他部分明顯不同 (Prasenjit Duara, review of *Awakening China*, 138)。據我們了解，費約翰的這本著作是以他以前的幾篇專題論文和博士論文為基礎的，這就牽涉到如何整合、協調全書的結構、行文、語氣

的問題。確實，五、六、七章與前面幾章有明顯的不同。

另外，我們在閱讀中很有感觸的是，思辨固然可嘉，但太多的思辨也擾亂了讀者思緒的連貫性。如果今後有可能修訂，作者應該考慮到把思辨與情節合理地糅合在一起，使人讀起來更輕鬆一些。

儘管如此，費著的魅力並不稍減。正如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蒙克 (Paul Monk) 所評價

的：「這是一本非常優秀的著作……由勝利者撰寫歷史的情況太普遍了，但是，最好的歷史著作既要審問勝利者，也要從歷史的灰燼中還原失敗者的骨肉和思想。」(Paul Monk, *Quadrant* [September 1997], 85)。

鑑於該書內容豐富，篇幅甚巨（中譯本45.6萬字、588頁），許多問題無法在這樣一篇即時性、介紹性的小文中說清，目前劉平正在撰寫一篇近二萬字的書評，特此說明。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目錄

2005年2月號、3月號

第35期 2005.2.28

- 田湘波 廣州武漢國民政府時期地方黨政體制剖析
郭德宏 陳獨秀平議 (全文版本)
張曉群 國有資產要不要轉換及如何轉換
張國慶 從森林法看環保法規 (全文版本)
盛邦和、何愛國 儒學與現代化：反抗與調適
程一凡 反歷史 (全文版本)
克羅澤爾 前蘇聯與中國前衛藝術 (全文版本)
嚴家祺 中俄邊界問題的十個事實——回應俄羅斯駐中國大使館公使銜參贊岡察洛夫等人文章 (全文版本)

第36期 2005.3.31

- 鍾延麟 回憶錄與大躍進研究——兼評中共對該歷史之處理手法與解釋邏輯
章慕榮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的陸軍武器裝備建設
王紅衛、柯偉 關於重新設置「西康省」的設想及其理論依據
姚尚建 直轄之爭與權力博弈
侯強 傳教士與晚清法制現代化的啟蒙
盛邦和 上世紀初葉日本疑古史學敘論
張懿紅 漸進社會工程的象徵：中國當代小說城鄉對立主題的變奏
屈雅紅 「悲哀的花神」：米斯特拉爾
杜應國 關於托洛茨基及其評價問題

圖片來源

封面、封二 作者提供。封二文字：金觀濤。

頁46、47 劉小軍攝。

頁49、116、119 作者提供。

頁86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from *Nature* 431, 1056. Copyright 2004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頁87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from *Nature* 431, 1058. Copyright 2004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頁97上 林書民：《催眠計劃》。作者提供。

頁97下 張慧：《解剖劇場：獨角》。作者提供。

頁98上 陳界仁：《加工廠》。作者提供。

頁98下 王寧德：《某一天》。作者提供。

頁99上 邵逸農、慕辰：《禮堂》。作者提供。

頁99下 岳敏君：《記憶中的風景》。作者提供。

頁100 岳敏君：《無人的風景》。作者提供。

頁101 王邦憲攝。

頁121、131 資料室圖片。

頁134 程青松、黃鸝：《我的攝影機不撒謊：先鋒電影人檔案——生於1961-1970》(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2002)，封面。

頁139 何炳棟：《讀史閱世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封面。

頁146 Jonathan Unger, e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 (New York: M. E. Sharpe, 2002), cover.

頁150 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份子》(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封面。

頁155 費約翰 (John Fitzgerald) 著，李恭忠等譯：《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北京：三聯書店，2004)，封面。

封三上 2004年上海雙年展布展現場。作者提供。

封三下 陳順築：《風中的記憶》。作者提供。

封底 傑夫·沃爾 (Jeff Wall)，田野工作。作者提供。